

《月令明义》对《月令》的儒学化诠释

蔡杰,翟奎凤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月令明义》是《月令》诠释史上有代表性而且风格独特的一部著作,也是黄道周后期《礼记》五解之一。该书为《月令》经文正名,并且将《月令》彻底儒学化,扫除历代儒者对经典的质疑。《月令明义》以“明义”的方式阐发律令条文背后的义理思想,在石斋学研究上可与黄道周生平事迹相互参照印证;在经学史价值上则体现了时代的解经特点与回应“礼是郑学”的论调,展现出黄道周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与明末时期科学实测的风气。

[关键词] 黄道周;《月令明义》;儒学化;石斋学;经学史价值

[中图分类号] B 248.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89X (2018) 02-0009-07

黄道周(1585—1646),福建漳浦人,字幼玄,号石斋。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历任崇祯朝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少詹事,南明弘光朝礼部尚书,隆武朝内阁首辅等职,后募兵抗清,被俘不屈,于隆武二年(1646)就义于南京。乾隆四十一年(1776)谥文以品行称他为“一代完人”;道光五年(1825)清廷将黄道周请入孔庙从祀。

黄道周是明末大儒,著名的易学家、理学家和书法家,时人徐霞客盘数天下名流时称:“至人唯一石斋,其字画为馆阁第一,文章为国朝第一,人品为海宇第一,其学问直接周孔,为古今第一。”^{[1]879}所谓学问直追周孔,即指黄道周以六经救世,重拾经世致用的儒家精神;特别是其学术生涯的后期,兼容并跨越汉宋,回归六经,直追周孔,《礼记》五解便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蛊惑天下,黄道周痛心疾首,他主张以六经救世,上疏以六经授太子,并“在长安中,闭门深于幽谷,今复作小书生,再翻传注”^{[2]770},亲撰《洪范明义》《月令明义》《儒行集传》《缁衣集传》《表记集传》《坊记集

传》《孝经集传》等,此中即包括了著名的《礼记》五解。

《月令》原文多涉天文物理,黄道周《月令明义》旨不在名物训诂,而是阐发经文背后的义理,将《月令》篇彻底礼学化与儒学化。本文即主要讨论黄道周《月令明义》在石斋学研究及《月令》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术价值。

一、为《月令》正名

《月令》的成篇年代自古有争议,主流有两种观点^①,一者认为系周公所作,或说是成篇于周代,有贾逵、马融、鲁恭、蔡邕、王素、戴震、孙星衍、黄以周等持此说;一者认为出于《吕氏春秋》,有郑玄、卢植、高诱、梁玉绳、万斯大、王引之、张文虎、任铭善等。由于经学大师郑玄的质疑,后说在历代产生不小影响。

黄道周在《月令明义》中提到“郑玄以太尉秦官,疑《月令》为吕秦作也”^{[3]孟夏章,3},就点明了郑玄所质疑的理由,郑玄认为:“《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

[收稿日期] 2017-10-15

[修回日期] 2017-12-28

[基金项目] 齐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重点项目

[作者简介] 蔡杰(1992—),男,福建龙海人,硕士生,主要从事宋明理学、中国经学史研究。

翟奎凤(1980—),男,安徽利辛人,教授,博导,主要从事易学、宋明理学及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通讯作者)。

^① 王锷《礼记成书考》中罗列有七种观点,此处只论历代影响最大的两种。参见王锷:《礼记成书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68页。

投稿网址: <http://xuebao.jmu.edu.cn/>

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4]512}所谓“不合周法”者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月令》出现了“太尉”这个官名,郑玄说道“三王之官有司马,无太尉,秦官则有大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于古”^{[4]578},此处所谓“俗人”,孔颖达有疏云“俗人谓贾逵、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4]579}黄道周在《月令明义·孟夏章第四》中“命太尉”这一条目下,着重反驳郑说,力证《月令》是合于周礼的,为《月令》正名。

黄道周主要给出三点反驳的理由:其一,从“太尉”这个官名出发,他认为“或三代时有其官,汉袭用之,不必秦耳”。^{[3]孟夏章,3}也就是说“太尉”可能在上古三代就有此官实(虽不一定有此官名),直至汉代此官职仍然沿用。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春令称‘命相布德’,不必云丞相也”^{[3]孟夏章,3}，“丞相”这个官职在历史上从秦朝才开始正式设置^{[5]301}，但此前早有“相”一类的官员履行后世“丞相”的职能，譬如商代的傅悦、比干，周代的姜子牙、周公等，也就是说上三代虽无“丞相”的官名，但已有“丞相”的官职之实。“太尉”这个官职职能，也是一个道理，不一定从秦代开始，并且“秦草创不数载，张、陈尝称太尉，汉虽杂用，或有渊源”^{[3]孟夏章,3}，所谓渊源，正是来源于上三代。其实黄道周这一反驳的立足点，在于名实之辩，“太尉”“丞相”之名虽上古三代未有，但其官职职能或早已有之。也正是通过这一反驳，论证郑玄所依赖的论据之不可靠，说明了郑玄的观点不可取。

其二，有驳论之后，当也有立论，才能为《月令》正名，不至于使《月令》空无所依。于是黄道周给出第二点理由，论证《月令》合于周礼。他以汉初官制为例，“命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倪汤举秋，贡禹举冬，人各职一时”^{[3]孟夏章,4}，汉初赵尧、李舜、倪汤、贡禹四人分管四时，此制与《周礼》中分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相一致，所以认为“义实本于《周礼》”^{[3]孟夏章,4}。而这种配置正符合《月令》的条文“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所以说“其意亦与

《月令》相发”^{[3]孟夏章,4}，从而得出了《月令》“即《周官》之法”^{[3]孟夏章,4}，而不必囿于秦制。

其三，黄道周从《月令》的内涵出发，认为《月令》合于周礼的精神。他说道：“《月令》每言庆赏，不言诛罚；每言举贤遂良，不言逐谗放佞。其意只存于礼乐农，宽慈惠下。”^{[3]孟夏章,4}在古代，因时以行赏处罚，赏罚是并举并重的，如“春夏为德，秋冬为刑，先德后刑以养生”（《黄帝四经·十大经》），但是《月令》中的律令却多为庆赏，几乎不提刑罚，唯有每月条文之末提到违时的报应，也仅仅只是一句，无法与正文中庆赏、任举的条文等量齐观。黄道周注意到这一点，说“古今治法皆以赏罚并言，惟《月令》详于庆赏而略于刑威，秋令云斩刈必当，亦不过一言而已，盖盛世之遗文，仁主之要务也”^{[3]孟夏章,3}，所以黄道周认为《月令》是盛世的遗文，所谓“盛世”即指上古三代。

除此之外，黄道周还在其他章目中间接论述《月令》合于周礼，间接为《月令》正名。如在《月令》季冬之月“飭国典，论时令”这一条文下，黄道周更进一步论证了《月令》与《周官》的关系，“国典之与时令，犹《月令》之于《周官》。六典、六叙、六属、六职、六联、六计、八成、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皆典也；时令一而已，因岁、因月、因日、因星、因辰，观其赢缩，以为损益”。^{[3]季冬章,18}《周官》与《月令》的关系就是典令关系，是分与统的关系，亦即一多关系。《月令》以“时”为最高依据，统摄《周官》中的各类官职，由此说明《月令》与《周礼》密不可分，间接论证了《月令》是合于周礼的。

当然，黄道周不曾明确提出《月令》的作者是谁、成篇于何时。他在论述《月令》的精神是详庆赏而略刑罚之后，推出一个结语“故贾逵、蔡邕定以为周公所作，不以官仪疑其秦书也”^{[3]孟夏章,4}，黄道周在此没有给出自己的明确立场。但是细味《月令明义》全文，黄道周对郑玄之说是反对的，对《月令》为周公所作一说却无异议。所以虽然黄道周没有表明立场，但可以体味出他对二说的取舍与自己的主张倾向，也就是倾向于贾逵、蔡邕一说，尽管不曾完全同意。或者更具体地说，黄道周更注重的是《月

令》内容的实质,而不是《月令》作者是谁。如果已经能够论证了《月令》合于周礼,系盛世遗文,那么其作者到底是谁,这个问题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二、将《月令》儒学化

《月令》是律令式的条文,要说其直接与明显体现了儒家的某些思想,恐怕没有。于是有人甚至发难,认为“《月令》最初创制者不是儒家学者,是汉代戴圣将它编入《礼记》才成为儒家经典,但它并无典型的儒家思想,其礼仪也非儒家的礼仪”。^[6]虽然儒家学说的若干核心概念在《月令》当中鲜见,比如没有“仁”字,没有“孝”字,没有“弟(悌)”字,“义”与“诚”字也各只有一个,但是作为律令式的条文,没出现这一些思想性的术语概念,本在情理之中。

《月令》的律令条文并非不符合儒家思想,诸条文所体现出的仍是礼制精神,特别是像“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一类,更是完全发挥了礼学思想,“夫礼者,所以章疑别微,以为民坊者也”,(《礼记·坊记》)“民之所由生,礼为大,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礼记·哀公问》)《月令》与此思想可谓如出一辙。《月令》中的律令内容较少有义理思想的阐发,然而却是合于周礼的,所以毋宁说《月令》是一种制度之礼。

黄道周通过《月令明义》以“明义”的方式,阐发《月令》经文背后的思想义理,将条文律令式的《月令》彻底礼学化、儒学化。兹举首章《孟春章第一》的例子,首先关于“仁”的思想,仁是儒家学说的一个核心概念,《月令》条文中不曾出现“仁”字,而《月令明义》却深入推阐经文背后的“仁”,譬如经文“其味酸,其臭羶”,《明义》释之为“酸羶者,仁人之味也,君子闻其气以逮下卹物,敬礼贤,思其祖妣”^{[3]孟春月,2},将适宜春季的味道与气味解释为

仁人之味^①,于是仁人所具备的卹物、礼贤、思祖等品行便是应有之义,仁者爱人,仁者体恤自我而外的万物即是仁的体现,“礼贤”一方面是君主之外王的要求;一方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尊重贤人、重视贤德的精神。“思祖”则是儒家孝道与传统宗族观念的体现,至此儒家的思想内涵展露无遗。再如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麝,毋卵;掩骼埋胔”经文下,《明义》释为“破胎毁卵,则凤鸟不至;路多胔骼,则仁人不入”^{[3]孟春月,7},禁止破胎毁卵。黄道周不是阐发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的生态哲学,而是解释为圣王之道,所谓“凤鸟”传说中舜与文王时都出现过,喻指圣王之瑞;而埋掉路旁的尸骨,不是为了防止“死气逆生”^{[4]545},而是为了清理收拾出一个好的局面,以引入仁人贤者,至此《月令》经文背后的儒家思想显现。

其次,《月令明义》将《月令》律令条文背后的礼乐内涵阐发出来。譬如在仲春二月,日所在位置的问题上,黄道周认为日不在奎,而在东壁,并以此发明其礼乐内涵,“翼、壁相望,为文章礼乐之所从出,文章不明,则东壁失色;礼乐不备,则鸟翻无光”^{[3]仲春月,9},原本只是星宿位置,却以礼乐相释,以此将《月令》条文礼学化。再如在“命乐正习舞,释菜”经文下,《月令明义》阐释道“习舞,何也?曰古之为学者,舍礼乐何观矣!春舍菜于先师而合舞,秋颂乐于学宫而合声,皆学也,故入学而先王之道存焉”^{[3]仲春月,13},他认为经文中“习舞”主要是为了学习。在古代,礼乐是六艺之学的首要内容,所以说古人学习的内容为礼乐之道,礼乐存则先王之道存。由此可见,《月令明义》阐发原经文的礼学化倾向。

尽管《月令》本是律令式的条文,但这一些政令却是合于礼乐,体现儒家思想的。黄道周的《月令明义》便将《月令》经文背后的礼乐内涵阐发出来,将其彻底礼学化、儒学化,也通过如此方式间接为《月令》正名。至此,《月令》作为儒家经典文献,当再无有疑义。

① 将“仁”与春季相配,这可能受到董仲舒“月令”思想的影响,即“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三《五行相生第五十九》,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三、《月令明义》的石斋学研究价值

《月令明义》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石斋学研究的价值,一个是《明义》本身在《月令》经学史上的价值。其中石斋学研究的价值,除了上文提到的可以通过《月令明义》中的易历结合研究黄道周的治学方法,笔者再举一点以说明。

黄道周在《月令》经文“命太史衅龟筮,占兆审卦吉凶,是察阿党,则罪无有掩蔽”下,连置三段以讨论阿党,如此分量在整本《月令明义》当中是绝无仅有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黄道周对阿党的痛恨。纵观黄道周的一生,他刚中进士那一年(1622),即与文震孟、郑鄮约疏弹劾魏忠贤,表现出对阉党佞臣的厌恶。三年后又以经筵展书官的尊严,在阉党面前不曾膝行奉书,而是平步以进,当时魏忠贤目慑黄道周,黄道周却毫不畏惧,大义凛然。然而黄道周在其政治生涯当中,却多次受到小人佞臣的进谗陷害。崇祯四年(1631)黄道周因上疏解救受到阉党余孽陷害的钱龙锡,而官降三级调用;次年辞官离京之前,曾上疏用《周易·师卦》上六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来讽谏崇祯帝,规劝崇祯帝远离佞臣小人,“盖指温体仁、周延儒”^{[7]127}等。而上呈《月令明义》之前,即崇祯十一年(1638)又因受杨嗣昌等阁臣以“朋串挠乱”罪名,连降六级调用。此时黄道周对佞臣小人可谓痛恨至极,与此前上疏“小人勿用”类似,对阿党的痛恨与对皇帝的规劝自然而然地流露于《月令明义》当中。

黄道周在《月令明义》中,首先痛斥阿党的罪不可恕,“阿党而出,人之罪犹或可原也。阿党而入,人之罪不可原也。阿党而方,上命挠师期,此不可原也。阿党而轻,行师破夷人宗社,此又不可原也”。^{[3]孟冬章,3}接着极深刻地分析了阿党行为的产生,“凡人之阿党者,皆有大权位、势利所集,而后根株苞蘖生焉。势位不在,声影稀落,则与之者少矣”,^{[3]孟冬章,3}他认为阿党行为总是依附于拥有大势位的人,这在朝廷中自有其所指,而对皇帝也有提醒与劝诫的作用,使

之明晰阿党所在之处。最后黄道周特别举两处阿党横生的地方,并规劝皇帝深入体察,远离小人,其一是狱吏,“凡狱吏不严酷则贿赂不重,贿赂不重则阿党不行”^{[3]孟冬章,3},通过阿党横生说明狱吏严酷,劝诫朝廷以宽情为主,提倡仁政,所以黄道周对人君说道“人主宽大、敬慎、爱人,则狱吏无术,虽不察其声色,可也”。^{[3]孟冬章,3}其二是龟筮者,“龟筮者亦有阿党也”,^{[3]孟冬章,4}认为国家大事小事都要卜筮,那么“筮龟殫匮矣”,^{[3]孟冬章,3}并且卜筮太繁,容易被朝中小人所利用,于是阿党横生,即“使筮龟而亦有利于人,则其阿党人也滋甚”。^{[3]孟冬章,3}可以看出,黄道周对龟筮之法是有所反对的,他提倡圣人不占,至诚至敬,“古之圣人以至诚待人,以至诚事鬼神”,^{[3]孟冬章,3}所以黄道周对人君说道“人主惟虚心察理,不阿亲近,虽不用蓍龟,可也”。^{[3]孟冬章,4}观《月令》经文,本是较为正面地叙述衅龟筮、察阿党,但黄道周却对龟筮有所反对,着重阐发君主应体察宽厚,远离小人。此须结合黄道周自身的政治履历,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其在《月令明义》中所阐的来由与内涵,这大概就是清儒所言“其随事纳谏之忱,固无悖于经义”^{[3]提要,1}的道理。因而研究《月令明义》,反过来则对石斋学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别是与黄道周的实际践行相互参照解释。

四、《月令明义》的经学史价值

关于《月令明义》在经学史上的价值,对经典的解释,汉儒、宋儒、明末诸儒、清乾嘉诸儒各有风格倾向,黄道周对《月令》的诠释可视为明末经世致用之学的代表作。以《月令》孟春月“掩骼埋胔”经文为例,汉儒如郑玄解释为“谓死气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4]545}可以看出极可能受到汉代元气论的影响,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宋儒如马孟希解释为“推其所爱于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8]体现出了宋儒侧重心性情理的学术特点。清乾嘉诸儒中,如清代《礼记》注解代表作《礼记训纂》的作者朱彬,对此句释为“注‘谓死气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高注吕氏春秋曰:‘掩霾者,覆藏之也,顺木德而尚仁恩也。’释文:

“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胾。’胾亦作臠。”正义:“蜡氏‘掌除臠’,司农云‘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兽之骨皆是’。”^{[9]225}征引诸家之说,体现了乾嘉学术高举汉学,以及侧重名物训诂的特点。而黄道周解释为“破胎毁卵,则凤鸟不至;路多胾骼,则仁人不入”,^{[3]孟春章,7}阐发了王道仁政的主张,体现了明末时期所兴起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时代风气。在明末这一股经世致用的实学风气中,黄道周是其代表人物,于是此学术特点则深刻地反映在了《月令明义》解经当中,在经学史上标刻出了其时代特点。

《月令明义》在经学史上的价值,除了体现时代治学特点之外,笔者在此再举一例以说明。黄道周在对《月令》的诠释中,对郑玄注多有驳说,有力地回应了“礼是郑学”^{[4]515}的论调。其中一个突出的地方是郑玄认为作《月令》者将《月令》视为周历,而黄道周将其视为夏历,所以才有“十二辟卦”的易历结合相互阐发。比如季夏月经文“命渔师伐蛟、取鼃、登龟、取鼃”,郑玄认为“《周礼》曰‘秋献龟鱼’,又曰‘凡取龟用秋时’,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为此秋据周之时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书于此,似误也”^{[4]595},郑玄将《月令》视为周历,所以此处即出现矛盾。而中国古代历法,周历的正月为夏历的十一月,所以周历八月就是夏历六月,如果将《月令》视为周历,那么取龟的律令当在仲秋月,而不应在此季夏月,因而郑玄以为误。但黄道周认为《月令》是夏历,夏历季夏月取龟,亦即是周历八月,正符合《周礼》的“秋献龟鱼”与“凡取龟用秋时”,所以“周之八月为夏六月,何误乎?”^{[3]季夏章,13}如此对《月令》历法的定位相殊,例子甚多,还如孟秋《月令》经文“毋以封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币”下,“郑玄曰:尝出田邑,而此不封,失于古义。夫夏七月,周之九月,尝或以毕矣。何为失古义也?”^{[3]孟秋章,5}此类例子不复赘举。

除了对《月令》历法的定位不同之外,黄道周《月令明义》比郑玄注更体现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譬如仲冬《月令》经文的日位与星位,黄道周批评郑玄“既疑躔次之近秦官,又不疑中星之仍汉历,既明车服之异周时,又不明

汉制之参四代,亦粤稽之至意,阙慎之盛心也”,^{[3]仲冬章,9}他认为郑玄囿于文献,缺乏实事求是的意识,于是黄道周更采取改订经文的方式,示以明代正确的日位星位。再如孟春《月令》“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经文下,《月令明义》写道“郑玄曰‘是非周制也,盖取于殷时而有变焉’,夫殷之明堂则亦莫之考也”,^{[3]孟春章,2}对无从考求之处,黄道周保留了存疑的实事求是态度。这一点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应是明末时期科学实测风气的反映。

不过黄道周并未彻底打破“礼是郑学”的框架,《月令明义》引郑玄注共计22处,虽非唯郑玄是尊,但有不少是直接引用,作为自己的论证,可以看出黄道周大体上对郑学的认可。

从以上论述来看,黄道周的《月令明义》在经学史研究与石斋学研究两方面都有着重要价值。《四库总目》著录整个明代相关《礼记》者,仅胡广等人为科举应试所编《礼记大全》,与黄道周的《月令明义》《表记集传》《坊记集传》《缙衣集传》《儒行集传》。而《礼记大全》之所以著录,在于它因科举功用而影响甚大,并非就学术本身而言。并且因其多沿旧说,少有发明,清儒对此十分不屑,著录于《四库》全是为了“特欲全录明代五经,以见一朝之制度,姑并存之云尔”。^{[10]110}而黄道周的《礼记》五解却能在清儒苛刻的眼光中脱颖而出,则是因为在《礼记》经学史上有其独特地位,与重要的学术价值。所以整个明代的《礼记》学,可以称道者唯有黄道周的《礼记》五解。

[参考文献]

- [1] 褚绍唐,吴应寿,整理. 淇游日记 [M] // 徐霞客游记:卷七:下.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2] 翟奎凤,郑晨寅,蔡杰,整理. 答魏秉德书 [M] // 黄道周集:卷十九. 北京:中华书局,2017.
- [3] 黄道周. 月令明义 [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4] 郑玄,注,孔颖达,疏. 礼记正义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 [5] 邱树森,主编. 中国历代职官辞典 [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
- [6] 汤勤福. 《月令》祛疑——兼论政令、农书分离趋

- 势 [J]. 学术月刊, 2016, 48 (10): 131-143.
- [7] 侯真平, 校点. 黄子传 [M] // 黄道周年谱 (附传记).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 [8] 卫湜. 礼记集说: 卷三十九 [M]. 清通志堂经解本.
- [9] 朱彬. 礼记训纂: 上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 [10] 永瑢, 纪昀, 主编.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9.

Confucian Interpretation of Yue Ling by Expounding the Keynote of Yue Ling

CAI Jie, ZHAI Kui-feng

(Advanced Institute for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Huang Daozhou's Expounding the Keynote of Yue Li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is a representative and unique writing in the Yue Ling interpretation history, and also one of the five solutions of Book of Rites in his late period. The book proofs the title of Yue Ling, makes Yue Ling completely Confucianism, and sweeps away the Confucians' doubts of all ages. The Expounding the Keynote of Yue Ling expounds the righteous thoughts behind the provisions of the ruling in the way of Expounding the Keynote, which can be cross-referenced with the traces of Huang Daozhou in the study of Shizhai; the book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lassics explaining in that time and serves as a response to the view that "Book of Rites is a study of Zheng Xuan", which shows Huang Daozhou's realistic spirit of learning and the atmosphere of th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Huang Daozhou; Expounding the Keynote of Yue Ling; Confucianism; Shizhai; value of Confucian classics study
(责任编辑 杨中启)

+++++

(上接第 7 页)

- [34] 习近平: 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2-11-19 (2).
- [35]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N]. 人民日报, 2014-10-29 (2).

Xi Jinping's Humanism in the Thought on Soci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LI Long, LI Hui-min

(Academ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s people-centered thought is a contemporary expression of Marx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 is also a high degree of political rationality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Party's Nine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points out that the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headed by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unswervingly pursued a deepening reform and put forward proposals in the area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employment and social assistance. The goal of "people-centered" social construction shows the people's dominant position and reflects people-oriented orientation. The people-centered ideology is not only the core connot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but also indicates the direction for accelerating the building of a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social construction; people-centered; sharing the benefits of development; people-oriented

(责任编辑 杨中启)